

明清以来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论坛召开,学者认为

运用家谱资料应区分不同层面

本报记者 吴楠

随着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和地方志编撰需求的不断提高,家谱作为“地方文献”日益受到重视。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地域史研究的开展,学者普遍感到认识民众生活、基层社会,需要利用民间文献。相对于官方文献,这类文献对历史遮蔽较少,有利于建构民众史。谱牒之中保存的人物、家族、经济、移民、文化、民俗、教育等多方面的资料,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价值。2013年“明清以来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全国博士后学术论坛日前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会议聚焦家谱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明清以来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明清以来家谱比较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以及家谱资料对历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等议题。

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切入家谱研究

“谱牒的编撰形成了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表示,谱牒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发挥着特有的功用。以《世本》为代表的先秦谱牒,是正史编纂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表示,由于族谱中详细记录了家族系谱以及具体人物的生卒年、生平事迹,这些详尽、明确的记录可以为学术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提供帮助。

随着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和地方志编撰需求的不断提高,家谱作为“地方文献”日益受到重视。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告诉记者,传统文献中的“地方文献”除了地方志之外,家谱是大宗。

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陈支平表示,早些年家谱研究更注重对族谱的认识以及族谱所反映的乡土社会家族的演变,而现在的家谱研究则较为关注地域社会考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认为,在史学研究中,族谱除了被作为史料使用之外,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族谱文本的编纂、利用及传播加以探讨,目前也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

2011年,安徽师范大学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千年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预计明年年初出版《徽州家谱编年》和《宋元徽州谱序选编》、《明代徽州谱序选编》、《清代徽州谱序选编》。近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宋以后的宗族形态与社会变迁”结项成果《宋以后宗族形态的形成及地域比较》与《宋以后宗族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变迁》,以及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编辑的《族谱研究》已出版。

合理把握历史研究规范与文化认同的界限

谱牒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文化的认知与历史的真实性是无法等同的。陈支平提出,历史学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性,而文化则更多体现在人们的心理认同层面。在家谱研究中如何把握历史研究规范与文化认同的界限,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在历代所修谱牒中,叙及远祖时,绝大多数都要追溯到黄帝或炎帝。近千年来,生活在福建以至后来生活在台湾地区的居民,大多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河南地区,印证这种血缘与文化渊源关系的资料,更多体现在族谱中。

有学者认为,族谱文献的记述与历史的真实性存在差异,并不能影响研究者对于文化认知的分析以及这种认知的文化意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超越于历史真实性的文化认知,其所

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或许更有价值。“史学研究需要大量翔实的资料，以及缜密的逻辑推理，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具体到家谱与历史研究，史学工作者需要清楚其中哪些记录是真实可靠的，哪些记录并无真实性可言，但不是说不真实的部分就没有研究价值。”王振忠表示。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表示：“历史要做求真的考察，文化作为一种思想的传统，它的影响有时候要超出历史的范围。例如，司马迁所著《五帝本纪》流传了 2000 多年，这就是文化。”陈支平认为，“只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一道认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及包容性，才能从无限广阔的空间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祖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他也强调，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假如研究家族迁移问题，就要进行历史探源；若研究家族文化构建过程，则要更加重视族谱在其中所发挥的文化认同作用。

有所甄别地利用家谱资料

谈及史学研究方法，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范金民强调，论人论事，要甄别不同评价的记载。不同途径记录的相关内容，可以相互印证，以丰富相关内容，还原全貌；结合利用各种材料，还会得出新的结论。族谱就是重要的佐证材料。栾成显提出，这一过程中，对各种谱牒使用必须加以分辨，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很多情况下，宗族是建构出来的，与血缘并不一定一一对应，有的谱系前后甚至毫无关系，对此，应当有充分的谨慎，不能罔顾史学研究的复杂性，以‘不靠谱’的方式利用族谱。”王振忠提出，现代科技绝不能取代严肃的人文科学研究，不能以为依靠技术手段就能大大推进家谱以及相关的史学研究。